

珍视我们自己的信仰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信仰什么,常常引起外国人好奇。因为世界上自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据统计约占全部人口的84%。确实,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因此有外国人经常问,既然没信仰,那你生活有什么准则?用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一位资深的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对我说,载于旧约的“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最重要的信仰。我说,中国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是中国人的信条。

那位神学家说,这和我们的“黄金律”很相近,的确也很伟大,但我们是宗教信仰,有神在监督着,你们的信仰靠谁来监督?我回答说,我们的信仰是“文化信仰”,有“诸神”在监督,就是家人、朋友、同事、邻居,这种来自周围人的社会监督很有效,无处不在;还有自我监督,就是“良心”,我们讲“天地良心”、“君子慎独”,说的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天地是“道”,对于“道”的信奉、崇敬其实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信仰形态的信仰。它具有非人格神的特点,但具有最高命令的意义,对整个社会有确立价值、约束行为的功能。宗教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培育了人们的道德,建立了生活秩序,凝结了人群,固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但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没有信仰。信仰具有多种形态,文化信仰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而且它不排斥宗教信仰,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英国诗人艾略特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当然有自己的信仰传统。

其实,人类信仰是多元的。对一个人而言,也可能除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外,还有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乃至生活信仰。比如,因此因此提出,传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过时了,是否应当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其实,传统的价值是千百年以来由民众一代又一代沉淀形成的,不是由圣贤们规定的,虽然易于传代的精炼的表达往往是由圣贤们归纳和提炼的。今天不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环境,重新提炼和发展,形成契合当代时代特征的价值信仰,它应当是在传统价值信仰上的继承和扬弃。

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如在中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碧血一腔染山河”的马本斋。很多人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那么多人之流血牺牲,不都是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

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反而有的人变得困惑迷茫了,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甚至有些人一夜暴富引起人们心中失衡。许多人在感叹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失去了传统的信仰,又没有补充新的信仰。有人因此提出,传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过时了,是否应当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其实,传统的价值是千百年以来由民众一代又一代沉淀形成的,不是由圣贤们规定的,虽然易于传代的精炼的表达往往是由圣贤们归纳和提炼的。今天不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环境,重新提炼和发展,形成契合当代时代特征的价值信仰,它应当是在传统价值信仰上的继承和扬弃。

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应当成为社会价值和信仰的示范者和维护者。比如,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在构建和谐的竞争关系中如何实现法与道德的互补?在社会转型期,公职人员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在一些地方,当灾难事故发生时,有的政府部门第一反应,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辩解,乃至蒙蔽舆论。这就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失去信任,因为一些官员没有说出真相,所以就连带着说真相的官员也不被公众信任,带来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牺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当坚持信仰的自觉,更加珍视我们祖先传下的信仰,同时也应展现更加进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胸怀。当我们于“中国制造”之外与世界共同分享“中国精神”之时,我想一些外国友人对我们的“信仰之问”也会随之冰释。 赵启正

文学“畅销榜”：轻还是重？

2012年中国文坛的头等盛事,非莫言拿下诺贝尔文学奖莫属。诚如作家王家所言:“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堂皇皇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但是,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显示,去年的“莫言热”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的销售格局,畅销榜前20名中,网络文学、玄幻小说、官场小说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销售码洋,网络文学代表作家郭敬明仍占据“畅销书霸主”地位。

“畅销榜”不等于“好书榜”,“销售码洋”不等于“图书质量”,这是文学批评家和出版界应有的共识。就像一位网友说的:“拿帕瓦罗蒂和周杰伦比票房,没有任何意义。”综观当下的中国文坛,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在守望中继续坚持;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化文学),在探索中不断拓展;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在分化中强势繁衍。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繁态势,“一条鞭”的评价方法已不适用于讨论全部文学作品。

我们不能指着销售数字,大谈传统文学的无所作为,也不能照着茅盾文学奖,痛斥网络文学的一无是处。不同的作品,给予人不同的影响:有崇高的,也有庸俗的;有积极进取的,也有颓废消沉的;有宏大叙事的,也有个人絮叨的。时代给予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空间,作家为读者奉上五花八门的作品。不能一概而论的背后,是文学多样化的繁荣。

专心文学创作的作家可以将“畅销榜”看得很轻,也可以将它看得很重。在2012年度的“畅销榜”中,《百年孤独》《围城》这样的经典作品赫然在列,作家马尔克斯完成于1967年的《百年孤独》在半个世纪后仍高居我国文学作品畅销榜的第二位。“畅销榜”里坐得高的也许不如坐得久的,这也证明,真正的经典是跨越时空、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

当前,随着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和视听、网络的冲击,传统的严肃文学写作远非一帆风顺。一位作家沉寂10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拿下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对读者说:“请你记住,决不要以一首诗歌或一篇文章的发表与否争输赢,而是要与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论短长。”不必对着“畅销榜”哭哭啼啼,不争夺一时的排名高低,不计较一季的版税多少,把自己置身于“人类群星闪耀时”,做“一个执旗的人”是一个作家的抱负与眼界,是置身于欲望游戏、世俗规则的方法,也是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心灵土壤。 陈佳冉

不负责任的“官方否认” 有损公信力

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负责人不但立即否认,更声言要“报案、报警”。对此,《人民日报》批评说:“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再到今天证实接受调查,刘铁男的‘剧情’跌宕起伏。实名举报在先,组织调查在后,这再次说明,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5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每有负面新闻,第一时间张嘴否认,似乎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和官员的习惯性动作。网上微薄爆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盟巨额骗贷、恐吓威胁情妇等问题,中午举报,下午便有官方火速回应称“纯属污蔑造谣”。而现在看来,“造谣”的并不是网络举报,而是国家能源局发言人。

不做任何调查的轻易“否认”,实际上是护主或护脸心切,既不负责任,更让政府公信力蒙羞。前年,网上曝光昆明市发改委官员不雅照,举报人称“捡到U盘请有关部门收货”,记者第

一时间电话询问昆明发改委有关人士,竟被回称“无此人”,同时也没忘了加上一句“我们已经报警了”。而后再回称称不雅照是PS的。最终,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发改委不但确有其人,照片也是真的,当事官员被开除党籍、撤职。而昆明市发改委则再被推上风口浪尖,很多网民质疑,当初的“无此人”、“照片是PS”之说,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发改委有什么“资质”鉴定照片真伪?

每有网民质疑干部“火箭提拔”,被提拔者有背景,一些部门第一时间的回应也都特别简单

——符合规定、程序没问题。而当最终被证实提拔不符合规定,程序上出问题,当初的谎言式回应却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既无人道歉,也没有责任之说。不负责任的“否认”无成本,应该是一些官员和发言人“习惯性否认”的一大原因吧?

刘铁男因涉嫌腐败被调查,又一个“谣言”被证为事实,政府部门也好,官方发言人也罢,公信面前何以堪?或许,一些部门和官员压根就没拿政府公信当作多大一回事,才养成了不经调查核实,一张嘴就“否认”的惯性。 马泽明

打破“铁饭碗”

在充分准备近两年的基础上,今年江苏有望选择部分地区和单位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目前,江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这意味着公务员“终身制”可变成“合同制”,“铁饭碗”将变身“瓷饭碗”。 闵汝明



少年弑父杀姐让人情何以堪

5月12日凌晨,周口市原鹿邑县法院院长高天峰在家中被害,一起被害的还有他的女儿。案发前,高天峰的儿子就读于漯河某高中,由姐姐陪读。由于姐姐在陪读期间“管得严”,其遂雇用两名网友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杀害。

正在读高中的孩子,雇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真是一场可怕的人伦悲剧。很多网友初看“河南鹿邑县法院院长及女儿遇害”这个标题,本以为身为基层法院院长的父亲得罪了人,才遭此毒手。谁曾想,真相却让人不寒而

栗,儿子竟然因为姐姐对自己管得严而雇凶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有预谋地伤害自己的亲人,且手段如此残忍,与正在读高中的年纪形成了巨大反差,实在令人震惊,也值得反思。首先,被杀害的父亲高天峰是原鹿邑县法院院长,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他,最终却命丧自己儿子所雇的凶手刀下。这样巨大的反差,实在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这也不得不让人思考,这位少年为何没有从家长那里得到基本的“杀人偿命”的法律常识的熏陶?其次,凶手杀人的直接原因是“姐姐在陪读期间‘管得严’”。

从常理来分析,对一个高中生管得严,无非就是希望他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对读书会有要求,对课外活动会有限制。但仅因此,就雇凶杀害了自己的至亲,还是超出了常人的生活体验。会是什么样的管教能让一个少年动了杀心?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个高中生竟然可以轻易地“雇凶”杀人。这个高中生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交往,让他变得如此冷酷和暴戾?在对这起人伦悲剧感到震惊和唏嘘的同时,还需对家庭、亲情、教育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 魏巍

那些走向“幼儿园”的大学

大学宿舍前一场浪漫的生日烛光晚会,被突然从天而降的保安踢场,继而几盆冷水将蜡烛浇灭——没有了星星之火的校园,终于安全了!这就是西安某学院12日晚发生的一幕。

“点火一危险一灭火一安全”,这几乎就是校园管理的一种固化逻辑,在安全的帽子下,只要是火,管你是熊熊烈火还是微弱烛光,都好比染了禽流感的鸡——格杀勿论。处理的简单了,应对的确粗暴了,可是只要初衷是正义的、高尚的,手段嘛、方式嘛,情有可原——这还是一种荒唐的逻辑。如果这样的逻辑无比正确,那么它完全可以延展开来:为了防止复旦大学桶装水投毒悲剧发生,

全校禁止使用桶装水;为了防止学生跳楼自杀,窗户一律焊死;为了防止学生在网上看成人片、沉迷游戏,宽带一律减速甚至断网……不要说这样的荒唐只是想象和推理,这样的荒唐常常在现实中上演。“保安不懂浪漫的爱”,这种不懂的背后正是那些固化的逻辑格式化了他的头脑,在“安全”的正义旗帜下,踢场、浇水、扼杀浪漫……都似乎变得有理。见微知著,烛光晚会被踢场不过是某种逻辑的结果,只要这种逻辑没有弹性、缺乏人性,“安全”、“秩序”这些高尚的字眼都可能生出荒唐的孩子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光是面积大、楼房高、知识多这些表

象,更在于精神之开放、文化之多元、气质之包容,在于校园治理者对学生的尊重与宽容,在于校园管理方对学术自由和创新氛围的呵护与培养。一言以蔽之,那些把学术奉为天条、把教授学生奉为主人的大学,方配得上大学之“大”;那些把整齐划一的表面秩序、千篇一律的物理稳定看做最大成就的大学,已经背离“大”字,走向了侏儒化。如果今天这所大学把“烛光晚会”看成洪水猛兽,明天那所大学对一堂公开课如临大敌,后天又一所大学把学术自由谈贴上离经背道的标签,那么,用种种尺子来衡量限制的大学,精神本质而言,不过是一所成人云集的幼儿园而已。 华文

从刘铁男落马看“中国式反腐”

刘铁男落马了,这样的消息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作为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又一位副部级高官,刘铁男的落马可谓一波多折。从去年年底罗昌平的实名举报,到今年中纪委的调查,从一开始的“纯属造谣”,到现在的“严重违纪”,这起跨年反腐大剧的上演揭开了“中国式反腐”的新篇章。然而,当人们细品这出反腐大剧时,却意外地发现,它的幕后推手,不是中纪委,而是那些活跃在网络上的中国网民。

“中国式反腐”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参与,为实现政治清明的“中国梦”做贡献,这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网民们通过“集体围观”、实名举报,所表达的就是一种行使政治权利的意愿。本家中,包括罗昌平在内的广大网民,他们通过积极行使权利,提供了关于刘铁男违法的“铁证”,尽管刘铁男想尽了办法想要脱身,但是在这样的“铁证”面前,他也只能是百口莫辩。应该说,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网民的胜利,是“中国式反腐”的伟大胜利。

然而,中国的反腐倡廉真的到了只能靠网民来推进的地步吗?如果对广大网民委以如此重任,那么所谓的职能部门设立的意义又何在呢?的确,在现阶段,有关部门的反腐已经不能忽略在网络中的汹涌民意,他们需要将这些滔滔民意转化为反腐的正能量。然而,这样的反腐决不能替代正常制度的反腐工作,仅仅只能作为当下反腐工作的重要补充。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都要一起打,这在彰显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勇气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网络民意推动着反腐车轮的滚滚向前,但是这场反腐运动的主力军掌舵人依旧还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政府职能部门不能等到老百姓深受“老虎”、“苍蝇”之害并奋起反抗时才着手发力,他们必须拿出壮士割腕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魄力,用更为完善的制度锁住权力,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创造良好的条件,为构筑政治清明的“中国梦”凝聚更多的正能量。而这,也才是“中国式反腐”的真谛。 陈静

自从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提出“临时夫妻”后,这一话题很热。这两天,有媒体推出《临时夫妻现状调查》,再度引起舆论的关注。(5月14日《现代金报》)

临时夫妻不具有普遍性

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现在“临时夫妻”很热,似乎这个现象很是普遍,现在打工的人们就是这样,不需要理由就能够住在一起。这也因此造成,当前对“临时夫妻”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了许多的“羡慕嫉妒恨”。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着“临时夫妻”,但这一现象是否普遍,却值得商榷。“临时夫妻”这一话题,是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提出来的。当时刘丽讲的是“在我这个群体非常常见”。“这个群体”是指的所有农民工,还是指刘丽所在的洗脚行业?“非常常见”到底如何常见,是否已经普遍化?这一切,刘丽并没有细说。也就是说,从刘丽那里得不出关于“临时夫妻”的量化数据。

而在随后,媒体虽然调查报道了,但可以看到,所有的报道都回避了面上的数据,报道的当事人都是某某某女。特别是报道中讲,有“临时夫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住在一起谈不上感情,只是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给人的感觉,现在农民工在性上很开放。选择几个典型是可以的,但这几个典型有没有虚构夸大,是不是就能代表一个群体?如果只是寻找典型的话,那我们剥离农民工身份,可能会发现“临时夫妻”同样存在其他群体中,甚至说其他群体更严重。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恐怕都不能就此得出答案,认为中国目前普遍性,已经比西方人更开放了。

现在唯一能够找到的数据是,调查表明:有超过50%的人会在晚上空闲时选择看黄色录像或书刊来打发时间;55%的农民工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70%的农民工希望家属能来工地探亲。农民工处于“性饥饿”,这可以得到确认,但这并不代表就会出现性放纵。

事实上,就我们眼中看到的耳中听到的,也并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把农民工设想成“放养的羊”,现在与过去已然不同,众多农民工夫妻选择在一起打工,即使夫妻不在一起打工,也一般选择同乡一起打工——这种同乡的约束力是巨大的。而且,随着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以及普及,与家庭的距离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远。一味放大“临时夫妻”的普遍性,这是对农民工群体新的侮辱。现实中“临时夫妻”确实有,但并不是那么普遍,真要是那么普遍,那整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作为一个社会话题,“临时夫妻”确实值得关注,但在关注中必须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既不能无视也不能过分放大。过分放大“临时夫妻”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是对农民工群体的不负责任,而且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所有对“临时夫妻”的异常关注,都是要流氓。媒体在报道中,也不能故意耸人听闻。 毛建国

该教会孩子不要对老师绝对服从

为何一个小学校长可以轻易将另一个学校的6名女生带走?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与这些女生相识交往,学校有无察觉?种种疑点,都必须有个解答。相关涉案人员,必须得到法律的惩处。

花季少女遭性侵犯,这些年来屡有发生。每次案发,都会引来人们对不法之徒的痛骂,也都会引来人们对教育的反思。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和老师绝对服从,对老师行为不怀疑不反抗,教师这个职业被神圣化,许多学生盲信老师,根本不会想到老师中也可能有“坏人”,这种校园氛围里,很容易造就禽兽教师产生的土壤。而在具体的校园管理中,在一些学

校,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接触,往往缺乏明确、严格的界线,如果学校管理混乱,这就给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以可乘之机。此外,中小学防性侵教育的缺失,更让学生在性侵面前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对于许多孩子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不让人随意触摸他们身体的隐私部分,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也不知道,在哪些环境下有遭性侵犯的危险。他们更不知道,当某人不正常触摸和暴力侵犯后,无论如何,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可信的人。许多学校和家长有一种偏见,认为防性侵教育很“危险”,担心教育会变成

教训,教育部门对此往往也毫不关心,所以这一教育始终难以普及。反观国外,学校防性侵教育早已实现了系统化,在美国,专门对学生儿童、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设置了不同的防性侵课程。

对于孩子遭性侵,无论事后怎么惩处,都无法消弭孩子心中刻骨铭心的创伤,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一方面把教师“入口”,改进校园管理,防止一些害群之马利用老师的威信和权力,把脏手伸向孩童。另一方面,普及和强化防性侵教育,让孩子学会规避伤害和自救,有效防御来自成人世界的荼毒。 京文

对于孩子遭性侵犯,无论事后怎么惩处,都无法消弭孩子所受到的伤害,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

5月8日,海南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小学女生失踪,引老师家长恐慌,据查,这些女孩原来被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某及该市房管局职工冯某带走开房,经法医鉴定,犯罪嫌疑人并未与6名女生发生性行为。目前,二人已因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被警方刑拘。

就在几天前,甘肃陇西县教师刘军红因对8名未成年少女实施强奸和猥亵,被法院判处死缓。甘肃法院的法槌刚落定,数千里之外的万宁再次上演丑闻一幕,令人愤怒。